

# 《史通》版本源流考

傅振倫

唐朝刘知几（661—721年），是我国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。他平生著作很多。和当时学者合作的有8种：《三教珠英》、《氏族系录》、《唐书》、《高宗后修实录》、《中宗实录》、《则天大圣皇后实录》、《睿宗实录》、《太上皇实录》；独撰的有6种：《刘氏家史》15卷、《刘氏谱考》3卷、《史通》20卷、《睿宗实录》10卷、《上皇实录》5卷、《刘子玄集》30卷，計83卷。这些著作，惟《史通》流传下来，它是刘知几的代表作品。

刘知几在七、八世紀，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，領史职有三十多年之久。“尝以载削余暇，商榷史篇。下笔不休，遂盈筐篋。”“区分类聚，編而次之，”于景龙四年（710年）撰成《史通》。（《史通序录》）友人徐坚讀了他的稿子說道：“居史职者，宜置此书于座右。”（《旧唐书·刘子玄传》）这稿一直藏在家里，未曾刊布。他逝世之后，玄宗敕河南府就其家抄录副本，开元十年（722年）知几的次子刘餗，把它进呈皇覽。玄宗讀之称善，追赠他为工部尚书，諡曰文公。（新旧《唐书》本傳及《玉海》49卷）从此以后，这书才开始傳布起来。

历史之学，本非猎取名功或投人所好的“趋时之具”。刘氏《史通》惑古疑經，彈劾前人，所以流俗之人，不重其书。唐光化三年（900年）柳瓘之撰《释史》，批評它的缺点（《唐会要》63卷）。宋人宋子京又譏諷他“工訶古人，拙于用己”。（《新唐书·史臣傳总論》）孙何也著《駁史通》十余篇。（《宋史》306卷《孙何傳》）宋代印刷事业虽然很发达，但这些評斥也給《史通》的流传带来不利的影响。南宋学者朱晦翁，就以未見其书，引为遺憾。王应麟《玉海》征引《史通》文字，多譌字脫文，可見此书流传不广，又缺善本。明初編輯《永乐大典》，网罗典籍，頗为丰富，可是独遺漏了它。胡应麟《史书占毕》注，也苦时无刻本。这都又說明了到了明朝，《史通》仍然傳流不盛。張之象序《史通》說：“邇吳兴凌子遇知，

纂刻《史記評林》，曾不研审，往往自用，至以知几为宋人”。这自然也不足为怪了。

宋刻《史通》，今已不可得見。但从其他文献上还可考求一二。《新唐书·刘子玄傳》說：“子玄自以爲見用于时，而志不遂，乃著《史通》内外四十九篇，譏評今古”。足证《史通》目录所言《体統》、《紕繆》、《弛張》三佚篇，在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《新唐书》撰成之前，已經散佚了。南宋王应麟所見它的刻本，似有两种。《玉海》49卷引《中兴书目》說：“《史通》十卷，三十六篇。又有《体統》、《紕繆》、《弛張》三篇，缺”。盖当时通行的《史通》，都沒有这三篇。《玉海》49卷注又說：“《史通》內篇，《六家》至《弛張》第三十八篇，又《自叙》。”可見《自叙》列在三佚篇之后。这是王氏所見《史通》宋刻的一种。陆氏蜀本，似出宋刻，也是屬於这一系統。这种宋刻本目录作《体統》第三十六，《紕繆》第三十七，《弛張》第三十八，且总括云：“右定凡三十六篇，并前序及志第七篇，共三十八篇。”（亦見卢文弨《群书拾补·史通校正跋》），吴本也是如此。有人疑《体統》即《自叙》，（孙毓修《史通笥記》）也很近理。《史通》佚文三篇，有的宋本作佚文五篇。《玉海》49卷又說：“《史通》上秩自《六家》至《自叙》三十六篇，及前叙及志中共四十二篇。自《辨职》以下，缺《体統》、《紕繆》、《弛張》、《文质》、《褒貶》五篇。”这是王氏所見宋刻本的另一种。

章俊卿《群书考索》前集卷15說：“《史通》五十（原作三千，浦本引作五十）余篇，曰《六家》、《二体》、《載言》、《本紀》、《世家》、《列傳》、《表历》、《书志》、《論贊》、《序例》、《采撰》、《补注》、《品藻》、《直书》、《曲笔》、《鑑識》、《模拟》、《人物》、《覈才》、《煩省》、《紕繆》、《史官建置》、《疑古》、《惑經》、《汉书五行志錯誤并杂駁》等篇。”它所录篇名，不应为亡佚之篇。罗篪《識遺》：“刘知几《史通》辟迂固之謬曰：韓王名信，都古韓國，……”一条，不見

今本，或系《紕繆》之文，是此篇在南宋时尚存。章罗氏所見此书宋刻，比卢文昭所見宋本，更为完整。这可能是以上两刻以外的宋刻本。

又案《六家·尚书家》：“爰逮中叶”的“叶”字，卢氏校本说：“宋作‘荅’，尚是刘氏避諱元本”。《六家·春秋家》：“夏殷春秋”的“殷”字，《考索》作商；宋避諱，改“殷”为“商”。由此也可考見《史通》宋刻面目一斑。

明人所刻《史通》，有蜀本，有吳本。中叶以后，傳刻才多起来。

嘉靖十三年（1534年），上海陆深尝于江西得王舜典所贈蜀中刻本《史通》，他訂正了《曲笔》、《鑑識》兩篇的錯簡，类为一篇，以还《因习上篇》的缺佚，于次年校而刻之于蜀。学者重視其书，称为蜀本。虽自云补殘剔謬，但仍多脫譌，难于誦讀。儼山既刻《史通》，又采它的精华，附益后人論史的文字，参加自己的見解，別纂《史通会要》3篇，刻入《儼山外集》。

华亭張之象見宋刻《史通》，“文整句暢，大勝蜀刻。”他和同乡徐虞卿、馮美卿“參合众本，丹鉛点勘，”于万历五年（1577年）刻印。1961年中华书局所景印的，即是此本。

万历間，張鼎思得見陆儼山蜀刻本于莆田吳氏，校勘而訂正之。《曲笔篇》增430余字，《鑑識篇》增300余字，而去其自他篇竊入者60余字。文字完整，才可通讀了。但仍然不免脫誤，如《补注篇》缺其下半，“所捐”以下的文字，系采《因习篇》之語。而《因习篇》缺其上半，仅存13行，系自《史官篇》竄入。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張鼎思把它刻于豫章。自此以后，世多傳其本，号曰吳本。辛亥革命后，上海涵芬楼景印其书，刊入《四部丛刊》中，并据孙潜夫、顾千里校本作成《史通笺記》，附于书末。

万历之季，李維楨就張鼎思本，略加評論，刊行《史通評釋》20卷，但也有舛漏。西江郭孔延（即郭延年），又就其本并參以陆氏蜀刻，杂引文献以证之，續为評釋，附书李氏之后，定凡例，加序文而刊行之。它“援引踳駁，枝蔓无益。又疎于考訂，每多紕繆。”（見《史通訓故补·例言》），且遺漏很多，又犯明人通病，好竄易文字。更將《曲笔篇》“夫史之曲笔誣者”以下197字誤入《鑑識篇》者，加以厘正。这是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郭孔太、郭孔陵刻本。《四

庫全書》收入存目者，即是第二次所刻的本子。此后书塾間流行之书，大部分是郭氏刻本。

是后，王惟儉得到郭孔延《通釋》于中牟張林宗处，重加厘正，又参考了得自信阳王思延的張之象所見宋刻本，增《因习》一篇，更定《直书》、《曲笔》二篇。（《曲笔》一篇即增入119字）。此外，又校正114字，撰成《史通訓故》而刻之。它引証較詳，且多依据正史。選擇精確，世号善本，远勝郭氏之书。在旧刻中，它是比較完善的，俗称春風亭本。

清人北平黃叔琳，注解了《文心雕龙》之后，又注《史通》。他就王惟儉的《史通訓故》，更旁搜博采，广其所未备，删节其煩文，于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刊行。无錫蒲起龙先于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撰《史通通釋》，及黃书刊成，他又参考之而定稿。計采取王惟儉者13条，采取黃叔琳者8条。这书最后出，用力亦最勤。引据詳明，学者服其該博。但他也好改易原文，不如黃叔琳的謹严。刻于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，曰求放心齋本。

在这以后，紀昀嫌刘知几“自信太勇，立言好尽，而偏駁太甚，支蔓弗剪，乃删削《史通》之繁复，存其精要。”所取者記以朱笔，紕繆者点以綠笔，冗漫者点以紫笔。除二色所点外，更排比其文，尚皆相屬。別于书眉，作为評語，以醒眉目。道光十三年（1833年），涿州卢坤遂录朱笔为一帙，去浦书之支蔓者，付梓，題曰《史通刪繁》。这书內篇刪去《載言》、《表历》二篇，外篇刪去《疑古》、《点煩》二篇。《杂說上》的《左氏傳》、《公羊傳》和《汲冢紀年》三节，《杂說中》的《后魏书》二条，也都刪掉了。《載文》、《补注》、《邑里》、《品藻》、《直书》、《曲笔》、《鑑識》、《服才》、《煩省》、《杂述》等十篇，全录原文。此外各篇，都略有刪节。

辛亥革命后，研究国学的風气，一度很盛，这一重要古籍——《史通》的翻印，也盛极一时。或鉛印，或石印，或影印，版本不一；也有为之注釋或作选注的。

解放以后，出版事业与日俱进。1961年12月，中华书局为了紀念刘知几誕生1300周年，影印了張之象刻本《史通》，給研究我国史学及史学史的科学工作者，又增加了一部重要參考資料。

附录《史通版刻源流表》（圈內阿拉伯号码系现存古刻次第）：

